

21世纪传播学系列教材

COMMUNICATION

形象 传播学

杨钢元 / 著

21 世纪传播学系列教材

形象传播学

杨钢元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形象传播学/杨钢元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5

21 世纪传播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5662-0

I. ①形… II. ①杨… III. ①形象-传播学-教材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3254 号

21 世纪传播学系列教材

形象传播学

杨钢元 著

Xingxiang Chuanbo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6.5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71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P R E F A C E

序

如果把 1982 年北京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看成是传播学正式引进中国的话，到今年正好是 25 年。如果把 1997 年传播学和新闻学一起被教育部列为国家一级学科看成是传播学的重要性被正式承认的标志的话，到今年正好是 10 年。在很短的时间里，传播学在中国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成为国内近年来发展相当快的学科。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正是我们盘点和思考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良机。

从教材建设方面看，传播学的引进，有赖国外（主要是美国）教材的译介。大量具有一定学术品牌的外国传播学教材的译介对促进中国传播学教学和研究功不可没，可是另一方面，中国传播学研究和教学面临的问题和环境有一定特殊性，国外成果的引进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课程和教学体系的建设。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传播学重新引进至今的这 20 多年中，国内的传播学教材出版从无到有，从 1983 年一本薄薄的《传播学（简介）》到现在书店里满满几书架的传播学教材，在教材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传播学教材建设的表面繁荣之下，也存在着一些泡沫的成分。国内不少传播学教材存在内容重复、观点陈旧、结构体例单一、缺乏系统性等问题。因此，在经过了自发的、初级的引介和吸收阶段之后，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传播学更上层楼，进入一个系统深化的研究与创新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现在出版的这一套“21 世纪传播学系列教材”，就是力图在有中国特色的传播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上做一些尝试。这套教材第一批书目包括《传播学纲要》、《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大众传播理论》、《组织传播》、《人际传播》、《跨文

化传播》、《网络传播学》、《视觉传播概论》等。今后本教材系列还将继续加入其他具有前沿性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传播学课程的教材，将涉及政治传播、宣传传播、广告传播、公关传播、影像传播、全球传播、文化研究、修辞与演讲、女性与传播等更具有专业性、前沿性的题目。

担任本系列教材第一批教材写作的，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长期从事以上课程教学和科研的中青年教师，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其他新闻传播院系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加入到本系列教材的编撰工作之中。

这套教材的编撰，主要有以下几个目标：

一是扩大目前传播学教学的视野。除了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外，增加研究方法、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网络传播、视觉传播等分册，力求使传播专业的学生能够适应多样的社会需求。

二是拉开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的层次。本套教材中既有针对大一新生的《传播学纲要》，也有针对本科高年级或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方法和各个不同领域的传播理论。每个领域独立成书后，使得教学内容更加充实，同时深度上也有明显增加，力求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科研能力，适应目前不断发展的传播学硕士培养阶段的教学要求。

三是更强调系统性。目前的本科阶段，许多学校仅开设传播理论概论一门传播学课程，研究生阶段的课程也不系统。本系列教材既可作为本科高年级的课外阅读或选修课教材，也可作为研究生低年级的必修教材，帮助学生系统地掌握传播学各领域的主要内容。

四是突出研究能力的培养。目前的传播学教材比较简略，多停留在知识传授上。本系列教材力求在介绍理论的同时，突出对研究方法的讨论，同时对许多前沿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也力求能够做全面客观的介绍，让学生及时抓住学科发展的脉络，引导他们对前沿问题展开自己的思考。

本系列丛书虽然以教材的形式出现，但是由于国内可以参照的现成教材不多，写作者基本都是把它当成专著来创作的。他们不仅对国内外有关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整理，而且结合教学 and 实际中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对那些与我国当前实际最贴近的理论问题进行介绍和讨论，在表述上也更贴近中国使用者的习惯，这一优势是由国外著作翻译而来的教材所不具有的。

我们是第一次编撰这样大型的传播学系列教材，在选题和具体内容上肯定还存在着不足，希望社会各界在使用过程中，及时地提出批评意见，以利于我们将来的修订。本系列教材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985 项目的资助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希望这套“21 世纪传播学系列教材”的出版，能够为我国 21 世纪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添砖加瓦！

郭庆光

2007 年 6 月

形象传播，这个古老到人类诞生之初的传播形态，在高速发展的当代传播技术的强力“加持护佑”下，又一次卷土重来，强烈要求与人类高度发达的符号传播形态分享天下。20 世纪被称作“语言学的时代”。而如今，带摄像头手机、监控摄像头、摄像机、照相机已经无处不在，凭借通信网络让形象弥漫在人类传播的每一个角落，并令符号传播在许多传播领域黯然失色。一时间，“媒介融合”取代了符号的唯我独尊，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命题在实践里得到了最鲜明的印证。

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形象传播的理论阐释系统大都是以语言学、符号学为理论框架建构的，深深地印着传统理论范式的烙印。但在高科技传播技术令讯息的传播量大大超越了人类信息同步接收解读能力的背景下，我们已经处于对自己所传播的信息内容并不能完全掌控的新的传播状态下；这种状况导致了以符号信息的组织、建构等线性符号组合为基本框架的既有理论系统，对形象承载和传播信息的解释已明显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因此，理论深化是人类传播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如果说有史以来人类信息传播的主流形态是符号或符号化传播形式，因而对形象传播规律探索的实践需求尚不急迫的话，那么，随着当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形象传播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则建立独立的形象传播学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问题是，形象传播学与符号学是否是并立关系，有无自身的有别于符号学的规律？

中国先贤在最初探讨信息传播问题时就以“形”、“名”并称，“形名”是百家争鸣的基本母题之一。古希腊柏拉图有“镜子说”、“模仿说”等形象传播的命题传世；亚里士多德则既有专门探讨语言符号传播的《修辞术》和《亚历山大修辞学》，也有系统探讨形象传播的《论诗》。可见，从源头而言，形象传播现象并没有逃出

先贤的视野。

而现代学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按照李幼蒸先生的概括,大致分为三派:一派是以皮尔士学说为代表的遍及“形名”的“具有综合性与实用性”的广义系统,第二派是以索绪尔、格雷马斯理论为代表的以语言为中心的符号学系统,第三派则是艾柯“以语用学通讯论为基础”试图统合上述两派的“普遍记号代码论”。^①在笔者看来,艾柯应是皮尔士系统的继承与发展,二者的研究对象都是普遍、综合的形名现象;而符号学系统则是以符号即“名”为研究的核心,正如索绪尔所强调的,其研究对象是以社会的任意性约定为基础的符号系统。^②而著名的“能指”、“所指”的区分,也是以任意性为前提的对符号的界定,而非所有传播信息载体的共性。

目前在总括的“形名学”或“普遍记号代码论”屋檐下,“符号学”已另立门户,而“形象传播学”则至今仍“待字闺中”。既然以语言学为典范的符号学可以从“普遍记号代码论”中独立出来,那么,以形象传播学为典范的涵盖非符号传播现象的学科体系作为“普遍记号代码论”的另一组成部分,如果其确有由对象特殊性带来的自身特有的规律系统,又有什么理由不能另立门户呢?从社会实践进程看,随着形象传播的社会化普及,后者另立门户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了。

那么,以形象传播为典范的非符号传播究竟有无不同于符号传播的特殊规律呢?

实际上,“形”、“名”之分,已经道出了二者在对象上的不同。信息感知传播和信息符号化传播是人类信息传播的两种基本通道和信息形式,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建构性地生成了现实的信息传播形态。对比二者不难发现,符号传播是依存于社会传播实践的约定俗成的系统,而信息感知传播则首先是以个体经验过程为基础的信息传播过程。因而,“符号在本质上是社会的”^③,而非符号信息在本质上则是经验的。从建构的角度而言,信息感知传播具有更久远的建构历史,其与信息对应关系的建立,扎根于生命的进化史当中,凝聚于感知器官的进化生成里,有些对应关系甚至进化成人类对信息反应的本能形式。例如,视错觉从进化的角度看是有利于我们的生存方式的,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在理性上认识到错觉的存在,但在感性上,我们依然如故地“错”下去,而无法像符号那样将其更新。

因此,用符号学理论显然不能涵盖形象传播的所有现象。形象传播学的生存空间就在这里,即要从形象传播的信息特性入手,循着对其传播通道及其通道特性、具体路径以及对传播的限定、代码系统及其代码规则的整体把握,系统性地阐释形象传播的特有规律。至于具体阐释,即如后书,兹不赘言。

至于本书的体例,则不得不略赘数言。由于本领域的学科体系此前尚未建立起来,因此,作为初创之作,对理论传统的梳理就是一个不得不做的工作,否则就无法对相关研究领域做准确的定位。基于这个考量,本书对相关学术史的考察,虽已极其粗疏,却也花费了数章篇幅。待相关学术史独立出去后,这些篇什是可以大幅删减的。

另外,形象传播学的定位,从指导实践的角度而言,依然是较为宏观的。如同普通语

① 参见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② 参见[瑞士]索绪尔等编,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1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③ 同上书,39页。

言学之外还有修辞学、叙事学等更为贴近传播实践的相对微观层面的学科领域，在形象传播学之下，基于不同的具体媒介特性展开的传播规律及其效果研究，才具有更强的实践指导性。例如，同是绘画，中国的宣纸、绢丝、毛笔、水墨与西洋的画布、油彩、画笔、画刀，媒介特性不同，整体风貌、视觉效果、艺术追求等也就各不相同，各擅胜场。如何充分发挥不同媒介的信息传播潜力，需要对媒介特性做深入解析，这显然是形象层面之下的更具操作性的领域，无法在形象传播学层面获得充分阐释。

由于形象传播学的建构具有较大的系统性创新，自然会与既有理论语境产生较大反差，要想立即全面更新社会既有理论语境，必然会遇到很大的现实阻力。但我们毕竟已经进入了全方位的形象传播时代——摄像头遍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在我们的手机上安家落户，更不要说互联网络、电影电视等媒体。总之，屏媒体已经融入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因此笔者相信，随着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理论的普及，其社会效益终将显现出来。

杨钢元

2012 年春

1	第一章 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具象传播与符号传播的消长
1	第一节 人类前语言阶段的信息形态—— 信号的记忆、识别与模仿
4	第二节 原始语言的诞生——万象的命名系统
7	第三节 文字前实物化信息载体的诞生——驯养生物 生存方式对信息的物化保存复现需求
13	第四节 文字的诞生——应对相对大规模社会组织 对信息操控的特殊需求
16	第五节 思维转型时代——理性话语权的建立
21	第六节 脱离语境——印刷媒介逻辑自洽的 强权与美的绽放
23	第七节 声像的回归——全面信息消费时代来临
27	第二章 中国具象传播理论史概览
28	第一节 中国古代具象传播理论
33	第二节 “象”论：从“观”天地万象到“立象以 尽意”
39	第三节 “形”的塑造：中国古代文艺创作 方法理论概览
52	第三章 西方具象传播理论史概览
52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具象传播理论
60	第二节 中世纪至启蒙运动时代的创作方法理论

67	第三节 创作方法系统理论的经典：席勒的 《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75	第四节 19 世纪创作方法理论
83	第四章 现当代具象传播理论概览
83	第一节 西方现当代创作方法理论
89	第二节 苏联与中国现当代的创作方法理论
102	第三节 影像传播理论发展概述
107	第五章 传播的概念系统建构路径
107	第一节 信息
113	第二节 信息媒介：讯息通道与代码
128	第三节 传播代码单元的分类辨析：讯号、信号、符号、形名
137	第六章 具象传播与传播具象
137	第一节 像的解析
143	第二节 形象的信息传播通道
151	第三节 新具象传播方式崛起的影响
163	第七章 影像传播：三条路径与四种基础代码
163	第一节 影像传播的生成方式
170	第二节 影像传播的三条路径及其四种基础代码形式
179	第三节 蒙太奇理论、长镜头理论、大组合段理论的统一
190	第八章 形象传播的代码系统
191	第一节 从文艺创作方法看具象传播代码
196	第二节 具象传播的代码规则——感性认知的真实系统
201	第三节 具象传播的代码类别：理性时代形象的社会认知结构
206	第四节 具象代码系统的结构及相互关系
212	第五节 创作方法在文艺创作中的定位
224	第九章 形象传播代码形态分析
224	第一节 形象代码形态解析
237	第二节 形象传播代码系统的历史形态——以西方文艺发展史为例
252	后记

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具象传播与符号传播的消长

第一章

C H A P T E R 1

章

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继承了其进化史的所有成果。人类以其卓越的符号创造与传播能力超拔于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成为了万物的主宰，使得在单项能力上或体力上远胜于人类的各种生物不得不俯首称臣。因此，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① 是人类的信息传播能力，使人类的利于生存与发展的经验与技能等实践和智力成果得以承传与扩展，并反过来经过实践筛汰促进了人类整体能力乃至器官的进化发展，特别是智力的发展。

第一节 人类前语言阶段的信息形态——信号的记忆、识别与模仿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类早期信息传播方式如动作、表情、声音等具有无法保存的天然局限，因此，对于此阶段信息传播活动的考察恐怕将永远停留在推论—假说的水平上，而无法找到切实的证据。

从距今约 250 万年前开始，延续到距今 1 万年至 2 万年前左右止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发展进程极其艰辛与缓慢。在前期即直立人或猿人早期阶段，人类在信息获取、加工和传播能力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处于进化高端的动物相比，并无天壤之别。人类虽然在工具的使用特别是制作上略胜一筹，但也并不是地球上唯一有此能力的生物。这一时期的人类社会以血缘家族群体为基本单位，社会形态相对简单，群体内社会成员相对稀少，而不同血缘家族群体之间物质与精神联系都很少，信息交流主要在血缘家族成员间（如狩

① 参见 [德] 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34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猎中的协调行动)和家族成员与生态环境间(如对猎物的欺骗与恐吓)进行。人类基本的谋生方式是直接从自然获取生存所需的采集与渔猎方式。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对简单,人类思维与交流的需求与现实活动也自然简单。交流空间的狭小及其带来的交流语境的高度封闭,使得家族成员间经验与技能的承传,可以通过直接模仿得以实现。当然,具有超常的灵巧性的手、脑等器官的个体能力也会在物竞天择的筛汰中进入遗传,特别是当这种能力具有基因突变等生理优势时。

处于这一进化阶段的人类信息传播方式,可以从低于人类的其他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动物身上依稀看到其影子。据报道,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2006年登载的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称,同人类一样,猩猩也具备“传声筒”功能,不但能互相传授经验,还能把有用经验传授给后代。他们引导一群非洲黑猩猩做了一个“传声筒”游戏。实验工具是一只装有食物的盒子,有两种打开方法。研究人员只把其中一种方法传授给一只黑猩猩。这只黑猩猩用所学方法打开盒子并拿到食物后,大受鼓舞,并立即传授给一个同伴。一个“知识传递链”由此诞生。就这样,一只传一只,共有六只黑猩猩学会了研究人员所教的方法。由于第七只母猩猩的“女儿”不在身边,它拒绝参加游戏,“知识传递链”这才中断。该报道称,之前曾有研究表明,野生黑猩猩所掌握的信息可以代代相传,时间跨度约90年,跨越六代。研究人员称,这两组研究不谋而合,这次研究是对此前发现的重要证明。^①这是第一次有实验数据表明,人类并不是唯一能把信息世代相传的生物。可见,信息的传递并不必然依赖符号,信号同样可以承担传播信息的作用。同样有实验证明,即便没有语言系统,黑猩猩也能够通过声音进行某些相对简单的信息传达。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灵长类动物专家发现,黑猩猩可以通过发出高调的噪音或低调的咕噜声,明确地告诉对方它们在围栏内发现的食物。科学家将黑猩猩发现不同食物时发出的不同声音录下来,然后再将这些声音播放给围栏中的黑猩猩。当黑猩猩听到代表“面包”的声音时,它们就会查看在围栏里经常发现面包的地方;当播放代表“苹果”的声音时,黑猩猩便随之去寻找苹果。而黑猩猩单独进食的时候,几乎从不发出声音。^②这种符号化信号在传播活动中的运用,可以说是语言的萌芽状态。然而,单纯的、孤立的符号化信号行为,由于不具备系统性与丰富性,因而对思维的清晰与逻辑化助益很少,很难发挥智人的语言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尽管如此,上述模仿与鸣叫行为,已经蕴藏了人类传播行为的原始秘密:模仿是信号—形象传播的原始形态,鸣叫则是符号传播的原始形态,它们分别构成了当今“形名学”中“形学”与“名学”(符号学)的原始基础。

信息形态是与信息处理和传播方式互为表里的。对人类而言,各种信息形态随着人类信息处理与传播能力的实践性拓展而发展,人类进而演化出与之相契合的思维方式。

在没有现代语言思维的条件下,猿人进化到智人这一过程中相对日趋增大的大脑容量是由于什么功能的需求而进化出来的呢?在原始人的生存方式中,与相对日益复杂的运动方式及其能力对大脑容量的需求相比,或许更具能动性的需求来自其感知与记忆外界事物的客观需求;简言之,是人类应对生存环境变化而不断增强的对信号—形象的辨别与记忆

① 参见《黑猩猩能互相传授有用经验》,载《深圳特区报》,2006-08-31。

② 参见《科学家首次发现黑猩猩会说话 粗糙语言表达看法》,载《北京科技报》,2005-10-26。

能力的需求,即对对象世界感性形式的区分与知识积累,或曰认知图式的建构。当然,信息处理与行动实践是互为表里的,但受此阶段人类生存方式的制约,其应对环境的能力比后人更加依赖于感知与记忆。例如,居住在非洲中部的最原始的民族——俾格米人(Pygmies),生活在原始社会状态下,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氏族制,七八户组成一个集体,没有私有观念,没有文字,没有数字和时间概念,甚至不会人工取火,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其发展水平只达到早期智人的程度。然而,他们的听觉、视觉和嗅觉都超乎寻常地灵敏,堪称捕猎高手。如果一只蜜蜂在距离他们10米外飞过,他们便能准确地说出蜜蜂的种类和雄雌。^①我们当代人利用率相对很低的记忆力,或许便是拜原始人阶段的这种生存能力所赐。

综上所述,直立人后期阶段的人类主要依赖的是非符号的信号。由于缺乏符号工具,他们不得不精进其感知力与记忆力,以具象识别与记忆为基础的实物—形象思维方式应是其基本思维形态,实物指示、形体表情动作、模仿、示范、鸣叫、敲击、抚摩等是其基本传播形态。同样地,在动物中普遍存在的诸如威胁、顺从、示弱、讨好等形体表情传播形态,也会大量存在于人类此阶段的传播活动中。而在直立人向智人、信号传播向以有声分节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人类语言逐渐发展的进程中,首先产生出杂糅动作和声音特征模仿的原始形声—表情—手势交流方式,其中的手势由于交流互动而固定化,因而最先具有了符号的性质,并发展成为交流者建立在共同经验基础上的意会方式。

这里有必要仔细区分偶尔的动作或声音模仿与符号性声音、动作的性质。偶尔的、即兴的再现式模仿固然可以通过交流者彼此意会的方式来传播信息,它或许是早期主要的信息交流方式,但它是追随形象思维的回忆或想象的模仿再现,因而它们只能算是信号,因为其不具备约定俗成的固定意义。然而,如果某个声音或动作的模仿或使用被使用者固定为特定的意义,那么它就具备了符号的性质或曰成为了符号化的信号,即便它或许只是一些孤立的符号,而不像语言等现代符号系统那样具有完整的符号体系和系统规则。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当代。话剧或影视演员的表演不能被归类到符号系统中去,而京剧和芭蕾舞等剧种的许多程式化的动作则具有符号性的特质。

原始形声—表情—手势交流方式,作为在信号传播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符号传播方式的过渡形态,甚至长期与有声语言并存,这在人类学中存在着大量证据:

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她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至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当一伙妇女聚集在帐篷里,她们中间笼罩着死一般的沉寂,同时,她们却借助手指,或者更正确地说,借助胳膊和手彼此间进行着十分活跃的谈话:连续地让手或手肘呈各种姿势就作出了许多符号。^②

手势语言似乎很明显地在北美通用:只要提一提华盛顿学院人种学研究室的

^① 参见互动百科词条“俾格米人”,见 <http://www.hudong.com/wiki/%E4%BF%BE%E6%A0%BC%E7%B1%B3%E4%BA%BA>, 2009-12-01。

^② The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pp. 500-501, 转引自[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1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Reports》(《报告》)第一卷上刊登的马列利(G·Mallery)上校的杰出专著《手势语言》就够了。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它有自己的词汇、自己的句法、自己的形式。一个研究者说:“可以给这种手势语言编出一部厚厚的语法……即使根据下述事实也可以判断这种语言的丰富:不同部族的印第安人彼此不懂交谈对方的有声语言的任何一个词,却能够借助手指、头和脚的动作彼此交谈、闲扯和讲各种故事达半日之久。”^①

继实物—形象思维而起的形象—手势思维强化了思维的连贯性;而随着人类发声器官的进化,声音的符号性逐步加强,其他要素则相应弱化,现代意义上的以有声分节为基本特征的人类语言最终诞生。

第二节 原始语言的诞生——万象的命名系统

人类何时开始创造和系统使用语言,迄今仍无定论。21世纪初被发现的第一个人类语言基因——定位于人类第七染色体上的“FOXP2”,就大约于20万年前产生于基因序列中两个碱基对的变异,其结果是使人类可以清晰地发音了。及至距今约20万年至5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或古人阶段,据此推断应是人类有声分节语言的诞生期。虽然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但直立人日益增加的信息交流活动无疑对这一基因变异的遗传选择发挥了重大作用。抛开“获得性遗传”的争论不谈,这一基因的确切变异具有分水岭的意义,毕竟功能被基因所锚定了。此后短短几万年岁月里^②,人类进化的脚步也开始加速:种类繁多且日趋精细的石器被打制出来,并已制作出相对复杂的复合工具;火被控制与使用;兽皮被制成衣服用以御寒;埋葬死者风俗的形成、装饰品的使用和岩画的盛行反映出人类精神世界日趋复杂。而在这一切当中我们不难隐约感受到作为清晰思维和意识之工具的语言的影子。之后,现代人就取代了原始祖先,并排挤掉其他原始的竞争对手,成了地球的主宰。

从动物性信息交换方式中形成的由实物指示、形体表情动作、模仿、示范、鸣叫、敲击、抚摩等构成的原始体态交流方式,其思维的基本形态是实物—形象思维方式;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相对专门化的原始形声—表情—手势交流方式,与此阶段相应的是实物—形象思维和手势符号思维互补的思维方式。随着精确发音功能的获得,人类逐渐形成了与体态、手势相伴随共生的表意音符的有声分节语言,原始语言思维方式也随之开始出现。体态手势随着有声语言的成熟相应地逐步蜕变为与语言交流相伴随的“副语言”。当有声分节语言最终成为人类交际中的主导传播方式时,现代形象—符号思维方式的大门也就此打开了。

当然,上述信息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对应关系,是仅就思维方式与媒介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而言的,也就是说,媒介方式提供了思维方式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而思维的现实性,则

① [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1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② 有的学者将语言的诞生年代断代为5万年前,根据是一篇于2000年6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学报》的论文,采用父系传递的Y型染色体为研究对象,得到一个他们认为是人类最近共同老祖宗,距离我们只有5万多年;而此后人类演进的速度明显加快,因而推论是语言的产生发挥了动力作用。参见王士元、柯津云:《语言的起源及建模仿真初探》,载《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182~1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取决于人类的现实生存方式。人类建构在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知识—经验及其历史积淀,才是思维内容与形式的基础要素。同时,思维方式对应的是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特定情境,对应于信息形式的复杂性,不同思维方式之间也因此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且不说上述各种思维方式在当代人类生活中依然分别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观察—实验之于实物思维,造型艺术之于形象思维,哑语之于手势符号思维,等等,仅就符号思维方式的演进历程而言,其最初也不过主要是实物—形象思维的符号形态(特别是语言符号形态)而已,只是后来随着人类进入文明阶段,随着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的积淀,才逐渐发展出了现在的可以进行抽象推理演绎的诸如抽象性语言(区别于叙述语言)、数学、爻卦、数理逻辑等,以及直感引申象征的占卜、符契、烽火金鼓旗帜号令系统和标识服饰系统等各种符号系统。不过即便如此,语言作为形象思维载体的功能在今天也并没有消失,例如,在文学、历史、新闻等叙述性信息传播领域,它依然发挥着主要作用。

因此,现代语言与原始语言不可同日而语。现代语言通过分类、概括等伴随知识积累的图式建构演进,集约了大量感知信息,使我们不必过度依赖经验记忆便可应对环境。然而,在语言诞生之初,人类与自然界尚保持着相对全面的依存关系,语言由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熟悉与记忆周围自然万物的信息,是人类的生存需要:对事物微小细节信号的辨识与记忆的能力,是原始人类必备的生存技能。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现代人类与同样处于生物进化高端但没有有声语言系统的猿类之间的智力对比研究中得到间接的启示。据报道,日本京都大学研究员松泽哲郎及其灵长类研究所的同事于2007年对黑猩猩“阿尤穆”进行了一项记忆测试,让其通过用手指触摸屏上的数字这一方式,与成年人展开两项短期记忆测试对抗,结果黑猩猩胜出。不仅如此,在科学家弗朗辛·帕特森的教育下,出生于1971年的低地大猩猩“科科”,按人类智商标准已达到了在70至95之间的智力水平,掌握了1000多种美国手语词汇,了解了大约2000个英语口语单词的含义,能够与人类交流,语言能力与儿童相当(见图1—1)。另外,猩猩还被培养出了使用电脑屏幕上抽象的键盘符号表达自己想法的语言能力。^①这些个例足以说明,除了对发音的控制能力及其产生的影响以外,猿类与人类在信息处理能力上仅在程度上存在差异而已,而就记忆能力而言,经验复杂程度远低于现代人类的猿类,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具有优势。

直接的证据来自处于相对原始阶段的人类的语言特征。细节丰富的鲜明画面印象反映到原始语言形式上,就是原始人语言中区分细节差异的浩如烟海的实义词汇,相反地,由于知识与经验的相对匮乏,概括与抽象在语词中的体现则相对稀少。而这也正是形象思维与概念—抽象思维在思维材料方面的主要差别所在。关于早期语言的这一特点,我们透过现存原始民族的语言词汇所具有的特点仍可以窥探到蛛丝马迹:原始人语言的具体描绘性和实义词汇异常丰富的特征,正是后期直立人的信号传播实物—形象思维方式与现代人符号传播理性思维方式间的过渡阶段在信息处理方式差异上的具体表现。列维-布留尔在其著名的《原始思维》一书中就为我们萃集了大量关于这方面的人类学田野考察实例。这里

① 参见《猿类智力研究七大里程碑:黑猩猩记忆力超人类》,见 <http://tech.sina.com.cn/geo/animals/news/2011-08-10/0926853.shtml>, 2011-08-10。



图 1—1 猿类懂得使用语言（图片来源：Bettmann/Corbis）

仅摘引一段^①：

格利尔森说，“在库可钦族（Kuki-Chin）^②的语言中，用于表达彼此相近的概念的用语数量之大”，使人很难对各种土语的词汇进行比较。他又说，“在卢舍人（Lushei）的语言中，用于蚁名的有 10 个词，大概是表示蚁的各个变种；用于篓篮名的有 20 个词；有不同的词用于不同种类的鹿，但没有一个词用于鹿的一般概念”^③——北美印第安人“有许多用语用于云的常见的形状，用于天象的各种特征，这些用语几乎可以叫做科学术语，它们根本不能翻译，而且在欧洲人的语言中也找不到与它们同义的术语。例如，奥基伯威人对于从两朵云的间隙中辉耀着的太阳有专门的名称。对于有时出现在满天乌云之间的一小片微弱的浅蓝色光辉也有专门的名称”^④——克拉马特族印第安人对于狐、松鼠、蝴蝶或蛙没有类的术语，但每一个种又有自己的名称。在他们的语言中，实名词多得几乎不可数计^⑤……

列维-布留尔总结上述现象认为：

逻辑思维占上风的地方，已获得的知识的社会宝藏是通过概念来遗传和保存的。……但是相反地，在我们所谈的这些民族中间，这个宝藏则整个地或者差不多整个地以直观的形式表现在语言本身中。它是不能遗传的，因为儿童的模仿实际上是用不着教，用不着智力的努力，而只是靠记忆来实现的。……

概念的和抽象的思维的进步，使得早先用于表现比较具体的思维的描写材料减缩了。^⑥

① [法] 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166～16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② 居于缅甸西部及印度东部的民族，在缅甸被叫作钦族，在印度被叫作库克族。——原书译者注

③ Grierson,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iii. 3. p. 16. ——原书注

④ Kohl, Kitchi Gami: Wanderings round Lake Superior, p. 229. ——原书注

⑤ A. Gatschet, The Klamath Language, pp. 464, 500. ——原书注

⑥ [法] 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168～16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可见，诞生之初的人类语言，烙刻着实物—形象思维方式的深深印记，由其词汇所表征的图式中尚缺乏现代语言所积淀的抽象、概括性知识，因此，它更像一个世界万象的命名系统。

第三节 文字前实物化信息载体的诞生—— 驯养生物生存方式对信息的物化保存复现需求

就信息形式而言，语言毕竟是依附于声音的信息形式，转瞬即逝，无法保存，难以复现，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生活对信息传播与掌控的现实需求。因而，必定会有新的信息形式对其留下的需求空间加以填充。

追随或伴随语言诞生的信息形式是以渔猎和采集为生的晚期智人（距今四五万年至一万年）的雕刻和绘画这类实物模仿形态的信息载体。它同样反映了形象思维的特点。考古发现的原始岩画与雕刻品，显示了此阶段人类非凡的具象造型能力，即使与现代艺术家相比也不遑多让。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归纳道：“原始绘画艺术乃是原始民族生存竞争发达进步后两种力量所造成的美术工作。我们现在也可明白为什么绘画的才能在原始民族中是很普遍的了。只要他是个高明的猎者和手艺人，他大概也是个过得去的画家和雕刻家。用同样简单的说明，我们可以来解释在狩猎民族中很多的写实天才，为什么在低级的农耕和游牧民族中却非常稀少。”^①

当然，晚期智人的雕刻、绘画活动的目的，并非满足当代所谓“艺术”的需求，这一点，只要从岩洞绘画多绘于昏暗无光之处的事实便不难想见。

实际上，此阶段人类还盛行以人体为载体和对象的原始装饰行为，例如生活在距今约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就出土了数量非常丰富的穿孔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小石坠、鲛鱼眼上骨和刻沟的骨管等装饰品。涂绘、佩饰与黥痕、刺纹、穿鼻、凿齿等，无不反映了此阶段人类对具象信息意义的关心与投入，更体现了其非语言形式的信息表达追求。

在此阶段的后期，即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期，人类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变革发生了：人类偷吃了智慧的禁果，不再依靠自然的赐予而生存，而要依靠智慧控制和改造自然，满足自己的欲求——伊甸园的时代结束了，人类进入到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曙光初现。进入到1.2万年至1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这一时期气候温暖湿润，现代人获得了动植物驯化的技能，催发了新石器工具革命和制陶工艺的诞生，使人类如虎添翼，由此产生的农业与畜牧业生产方式，将人类与自然的全面依存关系打破（当然，前期必然有一个采猎与农牧混合的过渡阶段）。人类可以依赖相对集中的资源类别而生存，不必再全面精细地关注与了解身边的自然万物了。人类从此从自然界中异化出来，通过改造乃至创造自然，由自然的一员变成了自然的主宰，开始将自然纳入人类发展的轨道。农、牧、手工业等社会分工相对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的组织形式提出了客观需求。其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所带来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以及石器、陶器等生产、生活工具与社会财富的积累，使得社会形态日趋复杂，人类的信息需求由此被引上了新的方向：生产知识的信息需求，促发了天

① [德] 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1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